



宁夏师范学院学人文库

秦汉魏晋南北朝书信赏

QINHAN WEIJIN NANBEICHAO
SHUXIN SHANGXI

朱进国◎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



宁夏师范学院学人文库

秦汉魏晋南北朝书信赏析

QINHAN WEIJIN NANBEICHAO
SHUXIN SHANGXI

朱进国◎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秦汉魏晋南北朝书信赏析 / 朱进国著. -- 银川:
阳光出版社, 2013.9
ISBN 978-7-5525-1056-0

I. ①秦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书信—文学欣赏—中国—秦汉时代②书信—文学欣赏—中国—魏晋南北朝时代
IV. ①I207.6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27659号

秦汉魏晋南北朝书信赏析

朱进国 著

责任编辑 王佐红
封面设计 千寻
责任印制 郭迅生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
阳光出版社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(750001)
网 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电子信箱 yangguang@yrpubm.com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0013887

开 本 720mm×980mm 1/16
印 张 13.75
字 数 200千
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
印 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25-1056-0/I·373
定 价 2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前 言

在学校特色发展、内涵发展、科学发展，全面提高人才培养水平，提升教育质量的跨越式发展之际，宁夏师范学院“学人文库”终于破壳问世了。

为了呈现三十多年来一批学科中坚的代表性成果，推进学术繁荣，让宁夏师范学院这所年轻的本科院校师生的学术结晶有展示的平台，“学人文库”的编辑出版，必将是一件福荫后学的事业。

“学人文库”的著作与宁夏师范学院三十多年的历史相比，还是一个“新生儿”，但是有了这个开始，她会在阳光、风雨中成长、进步。我们相信，有前辈学者的筚路蓝缕，又有“后学”的薪火相传，诸多的学术积累定然会在漫长岁月中留下回响。值此之始，我们期望更多的学人以此为契机，潜心研究，锐意创造，积学、向学，奉献出更多更好的智慧成果。

“清水河畔静读书，六盘山下育英才”。宁夏师范学院得清水河之娟秀，六盘山之伟豪，虽然僻远贫闭，但有了宁夏师范学院一批批“学人”智慧的烛照，固原——这座历史文化古城必将焕发新的文化内涵。

“学人文库”本着开放的视野，以书系的形式融汇宁夏师范学院学人研究成果中的华彩乐章。无论以时间为序，还是按学科分类，我们需要呈现的就是术业有专攻的各类文风，彰显“宁师学苑”的片片风景。

“学人文库”编委会

书信的流变（代序）

书信文化历史悠久，具有特殊的魅力，是人类文明生活中出现极早、流行极广的一种实用性文体。关于它的源起，历来说法不一，众多的研究者从不同的方面对此作了探析，研究者的真知灼见，为我们把目光投向更悠远的历史，从深厚的文化沉积中去探寻线索，做了有益的铺垫。我这里不避孤陋，对书信的起源和它的演变做点探讨，供方家批评。

先从“专”字说起。“专”，甲骨文像手持纺锤（原始的捻线工具），从又或从寸，示以手拨运而使之旋转，为会意字。《甲骨文字典》训其“为转之本字”。因而从“专”之字大概都有转动之义。《诗经·小雅·斯干》“载弄之瓦”，毛传云：“瓦，纺专也。”纺专即纺锤，它的核心功能在于转，因此命名。

《甲骨文编》卷三有“专”字31例，又据《卜辞通纂》《甲骨文字集释》《殷墟卜辞综述》等，其字在卜辞中主要用为人名、地名。作地名之“专”，大概是从人名而来。作人名之“专”，有的以侯伯名，但更多的则是贞人或卜人名。迄今所能确定的卜辞中贞人有123个，据陈梦家考定，“专”出现于早期甲骨卜辞，为武丁晚期卜人。贞卜之人是掌卜问的史官，“祭祀占卜时代王言事，于卜辞中能‘转达’上帝鬼神之意”。其职责十分明确：在天地神人之间转言传意，所从事职业相当于后来的“执讯”。贞人而称“专”，可谓名实相符。

《说文》释“专”字，曰：“六寸簿也。”这应该属于引申义。“簿”即药，指手版。上古时无论贵贱皆执茹从事。《释名》：“贫，忽也。君有教令，及所启白，则书其上，备忽忘也。”又，《礼记·玉

藻》“史进象贫，书思对命”，郑玄注：“思，所念思将以告君命者也。对，所以对君者也。命，所受君命者也。书之于筋，为遗忘也。”主在告命、受命两面。据《玉藻》，其长度为二尺六寸，这是礼制严明情况下的规定。那么，在告命、受命作为原始文明中某种需要而出现之时，就必然已有其相应粗陋而原始之“妨”。书而备忘，用为告、受，这就是“专”——转言传意之义所在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交往日益频繁，音讯转传应运而生。郭沫若先生在《卜辞通纂》中，曾就所辑第431片、512片、513片甲骨卜辞作过一番考释，认为这里记录的，是从千里之外的西北边境“传至殷京”（今河南安阳）的“边报”。在外来侵犯十分频仍的当时，凡有军情，则击鼓为号，借助鼓声传递消息。如遇特别紧急复杂的情况，鼓报之外，则有口头传报或诉诸文字形式的书报。这些卜文中“告曰”以下显系“边报”，很有可能就是“书之于筋”“以告君命”的传报文字，或是对原有通讯传报文字的转述。换句话说，这应该是记录或转载迄今发现最早的通讯文字，即传递军事情报的书信。在文明程度逐步提高、“书之于筋”已不成其难事的当时，书面通讯形式产生之必然是显而易见的。汉语中“音”“讯”二字并举联义，并作为“书信”的同义语，应该是原始背景下书信的独特传递方式。

交通的发展是讯传的先决条件。甲骨文、金文中“行”像四通之路，这足以说明殷人已重视道路的建设，应该有比较畅通的道路。又从卜辞以及地下发掘所提供的资料来看，殷代的交通工具，除水行的舟（两木相拼之木筏）而外，陆地上已大量使用的车、马，并已有严格的车马制，可知当时通行还是较为便利。所以诸如“往来”之词在卜文中已是屡见不鲜。与书信的传递同样需要有不断改善的交通条件的商业，在殷代已开始脱离实物交换的原始萌芽阶段，而进入货币贸易的实质性时期，如武丁卜辞中已有“锡（赐）贝”“锡贝朋”（贝以十枚为一朋）的记载，晚殷金文中的“贝”也多作为赏赐之物，而河南安阳大司空村还出土了青铜贝。这说明“贝朋”作为饰物的历史已告结束。还有，当时的手工业及冶铸业均已非常进步。其原料，有的要从很远的地

方运达，这必须要有畅通的交通作保证。因此，我们可以相信，在殷商时代，用于军事或官政的通讯，不仅是出于实际的需要，而且已有其现实的可能。

至周代，讯传发展为日益完备的“传递”制度。“传”为骚传之车，其字取义于“转”，为“专”之假借；“避”为释传之马。专置“行夫”之官掌邦国传递之事，特设“置邮”（释站）以“传命”，又据《礼记·曲礼下》《诗经·小雅·大东》《国语·周语中》等，可知周代在道路修建与保养方面更有规模性要求。《易·旅》中叙商人行旅，已有止宿“处”“所”，即旅馆之便。《周礼·地官·遗人》载：“凡国野之道，十里有庐，庐有饮食，三十里有宿，宿有路室，路室有委，五十里有市，市有候馆，候馆有积”，以仓廩委积供羁旅艰厄之用。由此，可以想见当时骚制之规模。一般情况下，信件由骚道一站一站传送，遇有紧急之事，则派特使专送。《左传·文公十七年》载：“郑子家传执讯而与之书，以告赵宣子。”杜注：“执讯，通讯问之官。”孔疏：“使执讯，使之行适晋也。”其讯传之便捷如此。这说明，在周代，通讯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阶段。于是，关于“书”“简书”的文字记载亦开始见于先秦古籍。从《诗经·郑风·子衿》“纵我不往，子宁不嗣音”中“嗣音”（续音讯）二字，可见其时书信已同时成为民间交往的重要媒介。刘勰所谓“春秋聘繁，书介弥盛”，姚鼐所谓“春秋之世……列国士大夫或为书相遗”，显系书信发展渐盛的情况，而并未溯及其源。

书信之“书”，《说文》释为“著也”。凡著于简册、上报下命、往来声问之文字，原先通称为“书”。书之为体，起于实用，它一开始就显示出其固有的特征：对象性、叙述性和传递性。

在最早的关于“书”的概念中，不分上下而唯见彼此。这一点，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书记》中说得很明白：“战国以前，君臣同书。”如乐毅《报燕王书》，实是因燕王“使人让（责备）乐毅，且谢（谢罪）之”而“使人献书报燕王”的一封回信。所以刘勰将“书”与“记”即奏记归为一体，给它下的定义也比较宽泛，认为“书者，舒也”，其特

点在于“舒布其言”。君臣同书、书奏同源，正是由书的告、受的意义决定了其原初的文化命运。

在古代，“书”“信”二词有别，“书”指函札，就是信件；“信”指使人，就是送信的使者。换句话说，现代所说的书信，古时称为“书”，如司马迁的《报任安书》、王安石的《答司马谏议书》等。现代汉语中，“书”仍保留了“书信”的意思，例如“情书”“家书”等。“信”字从人从言，是个会意字，即所谓“人言为信”，本义是言语真实、诚实。《说文》：“信，诚也。”《老子》：“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”用的就是其本义。“信”的今义为书信。

秦汉定制立仪，乃专以“上书”为章奏，以“赐书”为诏策。其时即便专于朝政策封制命的奏议与诏昭告，往往在习惯上也还是称作“书”，如司马相如《谏猎书》、路温《舒尚德缓刑书》以及汉文帝《赐南粤王赵佗书》、汉昭帝《赐燕王玺书》等。其实，上书者，上呈之书也，赐书者，下赐之书也，在本质上就是书信。而邹阳《狱中上梁王书》，则纯属为个人辩诬的书信，在内容和意义上与一般朝奏自是不同，从“上书”二字使用之泛，可见书信定体之初，必然显示出书、奏同源的文化源远。

从关于“舒”的指认中，刘勰说：“详总书体，本在尽言，言以散郁陶，托风采，故宜条畅以任气，优柔以释怀；文明从容，亦心声之献酬也。”写信的目的，在于把“心声”传达给对方。而真正使书信从文牍中完全脱离出来，成为朋友之间交流“心声”的工具，那是在汉代。

“汉来笔札，辞气纷纭。”司马迁之报任安，杨晖之酬会宗，马援之诫兄子等，或悲慨淋漓，抑扬寸心，或谆谆告诫，语重情长，已显露出书信在表情达意方面的独到之处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衰微，玄学大盛，士人多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，以谈议为尚。思想的解放，推动了书信体的发展。这时，涌现了一批书牍名家，有“号称翩翩”的阮瑀、“半简必录”的孔融、“留意词翰”的应瑒，还有曹丕、曹植、陈琳、嵇康等等。这些文人以自己遭逢乱世的独特体验，或议政，或论学，或谈玄，或述趣，或叙离，或记

游，扩大和丰富了书信的内容，增强了抒情的色彩。在交流思想、传达情意的同时，他们率性任气，天才艳发，往往假书信以骋才华，多情文并茂之作。六朝时骈风盛行，而如吴均、陶弘景等人的骈体小简，却全无一般骈文辞靡语滞的弊病，亦能以文藻新巧、意境超迈取胜。于是，书信又因其绚烂的艺术色彩，从单纯的应用性文体变为一种具有独立地位的文学样式。

唐宋两代崇尚古文。在新的文学风气的影响下，书牍之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，内容更切实际，笔法更趋平易，往往于议政、论学之际，叙说遭遇，慨叹人生，发自肺腑，出现了不少既有政治、学术价值，又十分亲切感人的书信体文学名篇。这在唐宋八大家的书信中最为多见，如韩愈《答李诩书》《答刘正夫书》，柳宗元《与友人论为文书》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，曾巩《寄欧阳舍人书》，苏轼《答谢民师书》，欧阳修《与高司谏书》，王安石《答司马谏议书》等。还有一些书信，则是落笔于眼前实境，即事而议，述乎小而发乎大，因情而叙，言乎志而明乎理。如柳宗元《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》，朋友遭火劫，家资毁于一旦，不去安慰，反为祝贺，这看似悖乎情理，然而通过透辟的分析，又句句入乎情理之中，可谓奇文奇论，妙笔惊人。韩愈《与陈给事书》《答窦秀才书》《应科目时与人书》等，引譬联类，情文相生，亦自气调不凡。再如王维《山中与裴秀才迪书》、王绩《答刺史杜之松书》、李翱《寄从弟正辞书》、李商隐《上河东公启》等一类书信，亦多于寻常间为文，抒怀而出，发引性灵。另外，盛唐人才辈出，对于恃才傲世、力图逞志的才子们来说，最大的人生危机莫过于怀才不遇，因此，上书以行干谒，在他们实是司空见惯之举。如李白《与韩荆州书》、韩愈《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》等等，旨在干谒而无意乞怜，吐辞恳切却不失清高，读此，亦可见一代之风气。在这里，书信的尽言以述怀的功能性意义，已体现为述怀以求进的功利性内容。

至明代，书信之流行更广，内容已涉乎社会人生、思想学术、个人经历、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。在黄宗羲所编《明文海》中，“书”凡列为二十五目，其包罗之广，于兹可见。明代学派纷呈，文人的思想比

较活跃，书信中论诗文、谈学问者颇多，如李梦阳《答周子书》《驳何氏论文书》，何景明《与李空同论诗书》，唐顺之《与茅鹿门主事书》《答蔡可泉书》等。笔调风格，也往往与其文学主张相应，如“前七子”中徐祯卿的《重与献吉书》，通篇作览游之叙，无一字旁迂，而字对句偶，铺张恣肆，洋洋千言，实有汉大赋之风致，魏晋书信之神韵。李贽标举“童心”，反对“道学”，《又与焦弱侯》《答耿司寇》等书信，文字泼辣，揭露深刻，正可体现其思想。三袁推崇“性灵”，宏道《与丘长孺书》等，可谓“任性而发”，真率自然。明末反清斗争中则多慷慨悲歌，夏完淳临难陈词，一封《狱中上母书》，发尽肺腑，悲壮恻人。

清初开朴学之风，“则以与书一门，为辨析学问之用，洒洒千言，多半考订为多。文家沿用其体，凡意所不宣者，恒于与书中倾吐之”。可见书至清代，作用又专与探讨学问有关。亦是魏晋之遗风。顾炎武有一组《与人书》，其中不乏此类书信。魏禧、袁枚、章学诚、方东树等清代学者，擅以书信谈文论学者比比皆是。而如洪亮吉《与孙季述书》、林则徐《又复苏鳌石》等，作为朋友间的普通书信，好似促膝谈心，推心置腹，然所述亦必涉乎学问、时政。这与当时“诵史鉴，考掌故，慷慨论天下事”（张维屏）的风气以及清人为文之重“立言”尚“因时”（梅曾亮）有关。而把对天下之事的关切表现为自我生命意义上的一种极致的，那就是林觉民的《与妻书》。这封信一开头便从情理关合处跌激出一个大起大落的严酷事实，从而列述四个生活片断，柔情蜜意，历历在叙，又郑重托孤，想象死后之以灵相傍、以哭相和、以梦相见。尤为感人的是，作者把一己之爱为天下之爱，将儿女情愫融入革命者的怀抱。与夏完淳《狱中上母书》之耿耿于“忠”“孝”不同的是，林氏更多地表现了20世纪初清王朝全面崩溃之际，在民主思想影响下，一代新人的觉醒与坚定、乐观的革命精神，此外，以郑燮十六封“家书”为代表，所叙虽为日常琐事，但情感真挚，文字朴实，信笔所到，却往往以小及大，“言近指远”，因而亦成为清人书信文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个部分。

作为与文章一体的古代书信，有它自身发生与发展的过程。书信原始状态就具有的实用性、对象性、叙述性、传递性，这就形成了它的因事随意的“尽言”特点和因机制宜的呈示方式。即以其名称而言，古代书信还有几种不同的名称。

筒——古代在纸张发明之前，用削成狭长的竹片作为书写材料。这种竹片称“筒”。用于写信的称为“书筒”，指信件。拿竹片当纸往上面写字，称之为“竹筒”。在书写之前，要挑选青竹筒，在微火上烤炙使之脱水。经烘干的竹筒易于书写，且不易为虫蛀。经烤灼，竹筒表皮渗出水滴，犹如人体“出汗”，故称经烘烤处理过的竹筒为“汗青”，引申为书册、史籍。

牍——古时书写用的薄而小的木片叫做“牍”。汉代对把“筒”和“牍”串起来写文章有明确规定：政府写诏书律令不得宽于三尺，民间写书信不得宽过一尺。故书信又名“尺牍”。

柬——与“筒”通用，是书信、名片、帖子之类的通称。如“请柬”“贺柬”“书筒”等。

素——古代称白绢为“素”。用一尺见方的白绢（或白绸）写成的书信，称为“尺素”，后为书信的代称。

笺——原指供题诗作画用的精美小竹片，后引申为书信的代称，也指写信或题词用的纸，如“便笺”“信笺”等。

函——原指封套。古代寄信用鱼形木匣递送，这种木匣称为“函”，后称信件为“函”，如“函件”“信函”“来函”“公函”等。

札——原指古代书写用的小而薄的木片，后指书信，如“信札”“书札”“手札”等。

在古代诗词作品中，“书信”往往和“鲤鱼”“双鲤”“双鱼”连在一起。例如，“相思望淮水，双鲤不应稀。”（刘禹锡《洛中送崔司业》）“蝶去莺飞无处问，隔水高楼，望断双鱼信。”（赵令畴《蝶恋花》）其中均使用了“鱼传尺素”的典故。这个典故出自汉代乐府诗《饮马长城窟行》：“客从远方来，遗我双鲤鱼。呼儿烹鲤鱼，中有尺素书。”实质上“双鲤鱼”是信封；“尺素”是一尺见方的本色丝绢，

就是信纸。诗中的“双鲤鱼”是指雕刻或彩绘成鱼形的两块木板，作为一底一盖。木板上刻有三道线槽。把书写在绢帛上的信放在两板中间，合拢齐缝后，用细绳在线槽处捆绕三圈，然后再穿过一个方孔缚住，在绳端或交叉处，封以黏土，上盖印章，以防私拆。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信封。收信人开启信封后，鱼形信函则分为两块，就成了“双鲤鱼”了。至于“呼儿烹鲤鱼”，使用艺术表述手法，形象生动。旧时有灯谜“呼儿烹鲤鱼——打一城市名”，谜底即为“开封”。这可从阅读欣赏侧面说明人们对这几句诗的理解。战国、秦汉时期用这种木制信封。魏晋之后流行用纸、帛作书写材料，信封由木板改为厚茧纸制的两片，两面仍绘有鲤鱼形。直至唐代，还在仿制鲤鱼形信封。因而，古代一直以“双鲤”代称书信。

雁足、雁帛、雁书、鸾笺——《汉书》记载苏武故事，言苏武被拘匈奴，牧羊于北海，后来汉朝廷要求匈奴放归苏武，匈奴谎称武已死。汉使则谓单于，汉皇在上林苑中，得北来雁，雁足上系着帛书，说苏武等在某泽中，单于只得放苏武归汉。于是，书信又有了雁足、雁帛、雁书等代名词。

再如，宋时蜀地善制十色彩笺，笺上隐然有花木麟鸾图案，这样，书信又多了一个别称：鸾笺。

八行书——旧时竖式信笺，多用红线划分八行，书信也别称八行书。

我们说，在古典散文中，唯有书信内容最广泛，形式最繁复，无论社会生活、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，上至君国大事，下如日常所感，皆可入书。而所谓尽言达意，全在一个“情”字。好的书信散文，往往心意真挚，情溢于辞，正如林纾所言，“大抵与书一定之体指陈时政，抗论世局，或叙离惊，或抒积愤，所贵情挚而语驯，能驾驭控勒，不致奔逝……奋其逸足，则法程自在，会心者自能深造之也”。所以，较诸其他一般文章，书信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更真实，体现的个人色彩更强烈。因而，读古人的书信，“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，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”。书信在写法上极为灵活，叙事、说

理、抒情无所不可，骈散长短各式俱宜，它特别讲求根据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，这就是被刘勰肯定为“百封各意”“亲疏得宜”的“尺牍之偏才”。

由此可见，中国古代书信，实际上远远超越了它本身的实用性的存在价值，以其独特的光彩，成为散文园地中一枝靓丽的奇葩。而在人类文明已进入电子通讯技术的今天，拜读前人至真、至善、至美的书信，您的心灵洁净而丰富，您的人生壮美而无憾。



目 录

- 谏逐客书 / 李斯 / 1
狱中上梁王书 / 邹阳 / 9
上谏猎书 / 司马相如 / 25
报任安书 / 司马迁 / 33
答苏武书 / 李陵 / 50
诫兄子严、敦书 / 马援 / 60
遗黄琼书 / 李固 / 65
与曹操论盛孝章书 / 孔融 / 70
出师表 / 诸葛亮 / 78
诫子书 / 诸葛亮 / 87
诫外生书 / 诸葛亮 / 90
与吴质书 / 曹丕 / 92
答繁钦书 / 曹丕 / 105
与杨德祖书 / 曹植 / 110
求自试表 / 曹植 / 118
与山巨源绝交书 / 嵇康 / 125
陈情表 / 李密 / 137

与桓秘书 / 习凿齿 / 150

登大雷岸与妹书 / 鲍照 / 157

答谢中书书 / 陶弘景 / 170

与陈伯之书 / 丘迟 / 175

与宋元思书 / 吴均 / 187

参考文献 / 194

浅谈秦汉魏晋南北朝书信（跋） / 196

后记 / 208

諫逐客書

李 斯

臣聞吏議逐客，竊以為過矣！

昔繆公求士，西取由余於戎，東得百里奚於宛，迎蹇叔於宋，求丕豹、公孫支於晉，此五子者，不產於秦，而繆公用之，並國二十，遂霸西戎。孝公用商鞅之法，移風易俗，民以殷盛，國以富彊，百姓樂用，諸侯親服，獲楚、魏之師，舉地千里，至今治彊。惠王用張儀之計，拔三川之地，西並巴、蜀，北收上郡，南取漢中，包九夷，制鄢、郢，東據成皋之險，割膏腴之壤，遂散六國之從，使之西面事秦，功施到今。昭王得范雎，廢穰侯，逐華陽，彊公室，杜私門，蠶食諸侯，使秦成帝業。此四君者，皆以客之功。由此觀之，客何負於秦哉！向使四君却客而弗內，疏士而弗用，是使國無富利之實，而秦無彊大之名也。

今陛下致昆山之玉，有隨、和之寶，垂明月之珠，服太阿之劍，乘紆離之馬，建翠鳳之旗，樹靈鼉之鼓。此數寶者，秦不生一焉，而陛下說之，何也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，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，犀象之器不為玩好，鄭、衛之女不充後宮，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廐，江南金錫不為用，西蜀丹青不為采。所以飾後宮、充下陳、娛心意、說耳目者，必出於秦然後可，則是宛珠之簪、傅玑之珥、阿縞之衣、綉之飾，不進於前，而隨俗雅化、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。夫擊甕叩缶、彈箏搏髀，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，真秦之聲也。鄭、衛桑間，韶虞、武象者，異國之樂也。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、衛，退彈箏而取韶虞，若是者何也？快